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第十章

克服障碍和解决问题

摘要:本章旨在探讨伙伴关系中存在的困难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联合国指出，“伙伴关系”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但也承认必须克服诸多障碍。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的“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特别活动便印证了这一点。在“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PE)项目中,我们遇到了诸多障碍,本文将分享相关经验,以期为类似背景下的利益攸关方提供借鉴。

本章探讨了伙伴关系面临的困难、挑战和困境。联合国指出，“伙伴关系”对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持续推进健康和福祉平等至关重要。然而,他们也承认,许多障碍必须克服,许多问题必须解决,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题为“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特别活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最佳开端:促进终身健康和福祉的社区合作方法”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W&PE)项目中,也遇到了诸多障碍。

合作关系常常因为复杂棘手的问题而失败,莱辛格称之为“棘手”问题。棘手问题

© 编辑（如有)和作者 2016 T. Lynch,《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
DOI 10.1007/978-3-319-31667-3_10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伙伴关系“并非邪恶,而是棘手、狡猾、混乱且庞大,并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且不断演变”（Leisinger 2015）。Pattberg等人（2012)的研究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们发现,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伙伴关系产出与其既定目标直接一致。

克服障碍和解决问题与伙伴关系的“运作方式”密切相关,并且通常取决于具体情况。本文中多次提及国际公民社会中心（ICSC)发布的《成功伙伴关系的九大基石》（2014,第14页）,该基石是其后三个阶段的副标题。这些基石是基于对成功和失败伙伴关系超过15年的研究而确定的,旨在构建成功的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ICSC 2014）。

语境

元治理

> 伙伴关系表明全球治理的一个新兴特征,即碎片化。碎片化的特点是缺乏协调和非层级化的制度安排,这往往导致同一议题领域内各项举措之间的重叠和竞争。缺乏协调,碎片化可能导致效率低下、资源冗余,以及看似庞大但实际影响甚微的治理格局。（ICSC 2014,第28页）

社区合作的理想是创建一个“混合空间”,其中包含“学术界、实践者和社区专家之间非等级化的互动”（Zeichner 2010,第 89 页）。然而,元治理的现实往往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项目伊始（2011年1月）,竞争和重叠就已存在。项目负责人最初对完成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有所抵触,尽管很明显这是任何希望成为游泳和水上安全讲师的人的必要条件,但以往的教学经验不被认可为“培训与评估”,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一位拥有多个教育学位的大学讲师

所有达到更高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AQF)级别的学生　然后被要求完成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需要进一步学习以证明他能够达到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的能力单元要求。这位领导者拥有十五年的学校全职教学经验;当时,他还有两年的高等教育全职教学经验,十多年来在游泳和水上安全领域的工作经验,并且持有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因此,似乎“一些关于培训资金和实施的政策和法规被农村地区的培训机构视为阻碍他们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以满足社区培训需求的努力”(Clayton等人, 2004年,第5页)。这项培训课程要求费用高昂(1600美元),耗时费力,并且构成了明显的障碍。

在建立伙伴关系时,商业资本主义与教育的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悖论,尤其是在《墨尔本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宣言》(2008年12月)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全球范围内,类似的极化现象也被认为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一个根本矛盾,而要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就必须弥合这一矛盾。

在一次周末讲师培训课程中,AUSTSWIM的商业理念向这位领导者揭示出来。AUSTSWIM采用的商业模式与这位领导者提出的教育理念(游泳和水上安全推广)并不一致。据解释,AUSTSWIM由所有利益相关者(讲师和合格的游泳教练)共同拥有,讲师成为加盟商,他们拥有销售AUSTSWIM产品的资格并已注册(个人交流,2011年2月5日)。建议讲师向每位学员收取350美元的报名费,其中215美元用于AUSTSWIM的行政管理费用,135美元归讲师所有(个人交流,2011年2月16日)。因此,大学的方案要求加盟商(拥有AUSTSWIM讲师资格的大学讲师)以折扣价进行授课。这样的方案在两方面与AUSTSWIM的商业模式不符:第一,这使得其他演讲者与学生最高收费 215 美元相比显得相当昂贵;第二,这可能会抢走吉普斯兰地区其他加盟商的生意。

竞争也深深渗透到社区之中。项目负责人第一次与休闲中心的游泳主管会面时,主管也给予了支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尽管明确提倡优先选择AUSTSWIM而非选定的ASCTA SAT作为培训机构,但相关途径仍在不断完善。这在维多利亚州乡村地区并不意外,因为那里的政策有时只允许AUSTSWIM作为游泳培训机构（Gosper 2012）。然而,项目负责人对此感到惊讶,因为AUSTSWIM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Swim Australia）、澳大利亚皇家救生协会（RLSSA)和澳大利亚冲浪救生协会（SLSA)在理念和工作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AUSTSWIM 2009）。

此外,AUSTSWIM认可这些机构提供的专业发展课程,并将其作为重新注册的认证积分,反之亦然。据澳大利亚游泳协会首席执行官罗斯·盖奇称，“AUSTSWIM阻碍了其他注册培训机构（RTO)向教练颁发执照”。

（Gosper 2012）,这是非法的。这条路径涉及变革,随后给社区带来了益处,然而,在这种背景下,它也被视为一种竞争。“在农村社区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中,竞争而非合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Balatti 和 Falk 2000;澳大利亚区域研究与学习中心2001；Clayton 等人2004； Owen 和 Bound 1998）。

2011年第一学期结束后,负责人决定在未来的所有合作项目中,由他/她负责与小学联络,而不是将这项工作完全交给游泳池游泳教练。然而,最初的安排被证明存在诸多问题,且缺乏代表性。最终确认哪些学校、班级、人数以及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参加,都被拖到了最后一刻,这给负责备课并希望确保安全的作者和教育专业的学生带来了诸多困难。

另一个最初损害合作途径,进而损害ASCTA在社区内声誉（且难以重建)的障碍,是游泳主管向小学社区提供的关于课程的错误信息。作者第一次与班主任和助教见面时,需要向他们保证课程的安全性,并为SAT游泳和水上安全项目辩护。游泳主管将大学生正在完成的SAT项目称为附属项目。这种行为只能用“培训市场竞争激烈”（Clayton等人，2004,第28页)来解释。这种行为与AUSTSWIM宣称的与澳大利亚游泳协会（Swim Australia)的紧密理念和工作关系不符（AUSTSWIM， 2009）。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小学游泳课上,一位游泳指导员指导教育专业的学生使用不恰当或不符合教学质量的策略,引发了一些问题。例如,二年级的一名学生不想参加课程的某个环节。这位教育专业的学生很理解孩子的情况,温和地鼓励他休息一下,等感觉舒服些再尝试。这时,游泳指导员走到学生和孩子面前,强硬地要求学生强迫孩子完成活动,不给孩子选择的余地。这位教育专业的学生没有理会游泳指导员的命令,继续进行正确的教学。之后,班主任也证实,这位教育专业的学生很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并与孩子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起事件凸显了将四年制大学学位(包括学科内容和教学法的深入学习)与周末完成的资格认证课程(辅以20小时的在职实践)相结合的难度。

此外,Robertson(2008,第19页)指出,即使是游泳教练的下一个进阶资格 培训与评估四级证书,“也未能提供在多元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培训所需的全部知识储备”。显然,高等教育学位与行业课程的衔接并非一帆风顺,在探讨两种教育差异时,这一点不容忽视。

另一个关于竞争意识的例子发生在2014年的网球“明日之星”项目中。当地网球俱乐部的会长在得知这项免费网球课程计划后,立即联系了项目负责人。起初,她对学校课程的意图感到疑惑和不安,担心这会与网球俱乐部形成竞争,甚至会挖走潜在的网球运动员。经过一番讨论,会长意识到推广网球才是最终的赢家,各方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合作。

政治和社会背景

合作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过程,“伙伴关系嵌入于政治和社会背景之中,这些背景会影响其成功的机会”(ICSC 2014,第29页)。情况有所改善。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各个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接受课程的孩子们;然而,存在政治和社会影响。

“最佳起步计划”启动之初,大学、学校和社区组织之间并无合作关系,也没有任何成功的合作经验。该计划实施的课程改革最终导致了大学生和小学生课程的调整。尤因（2010,第148页)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清晰的阐述:

> 变革通常指的是尝试新事物:从一种状态、形式或方向过渡到另一种状态、形式或方向。课程改革的意义远不止于变革 它直接表明这种变革将带来改进或提升。因此,课程改革意味着学生将受益于创新的教学实践、教材或教师理念及教学方法的转变。换言之,他们在学校的学习体验将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

表面上看,优化家庭作业和体育课体验的方法简单易行,但实际上却困难重重,需要克服或规避诸多障碍才能实现。该项目的宗旨被倡导并普遍认为是“为了孩子的最大利益”,这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共同的目标和动力。

> 继续提供机会发展儿童的健康、家庭和体育教育,旨在将《儿童权利公约》(CRC)本土化。《儿童权利公约》“是公认的国际条约,规定了儿童的基本权利以及各国政府履行这些权利的义务。它已被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接受和批准。”(Garvis 和 Pendergast， 2014 年,第 8 页)。

该公约共有 54 条,包含四项基本原则:不歧视;儿童的最大利益;生存、发展和保护;以及参与。

“儿童最佳利益”指的是“影响儿童的法律和行动应将儿童的最佳利益放在首位,并以最佳方式使他们受益”(Garvis 和 Pendergast ,2014 年,第 8 页)。特别是“《儿童权利公约》第 31 条,该条概述了儿童参与游戏和娱乐活动的权利;以及大会第二十七届儿童问题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一个适合儿童的世界》,该文件强调通过游戏和体育运动促进儿童的身心健康”。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大会2015 年第 3 页)支持该计划倡导儿童的最大利益。

基于优势的合作涉及学校和大学教师教育的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改革。以往的教学经验常常会被反思,以保持切合实际的期望,努力克服障碍,更好地理解在与众多不同个体（他们有时有着不同的优先事项)打交道时所涉及的复杂性,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最佳起步”计划的推出恰逢其时,因为吉普斯兰地区的社区合作得到了维多利亚州教育、就业和儿童发展部（DEECD)2011年发布的讨论文件《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的大力支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吉普斯兰的教育目标。该文件专门针对吉普斯兰的实际情况撰写,并参考了近期国家和州级层面的发展动态,包括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评估报告。文件指出,它“鼓励在现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加强院校之间的衔接安排”（ 2011年,第4页） 。此外,文件还阐述了许多利益相关者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时所面临的困难;然而,文件强调,这些途径对于吉普斯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该讨论文件指出,儿童及其家庭的积极体验有助于在社区内树立莫纳什大学的良好形象。该讨论文件将提高期望值和增强意识列为一项有针对性的策略,特别是“旨在改善中小学生对高等教育看法的学校参与/拓展项目”（ 2011年,第21页） 。

真正的变革涉及人们对周围环境信念的转变,这对相关教师而言可能具有威胁性和压力性（Sparkes， 1991） 。此外,变革往往会导致冲突、损失和挣扎,而这些恰恰是成功变革的根本所在（Fullan,1982） 。Dinan-Thompson（2001,第9页)认为，“真正的变革”更恰当的说法是“真实变革”,它包含了“情感的重要因素以及互动在教师变革中的作用” 。Hargreaves（ 1997,第109页)警告说,如果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忽视情感因素，“情感和感受只会以迂回的方式重新进入变革过程” 。因此,真实变革会考虑到那些常常导致变革失败的微观政治因素（Datnow， 1998； Dinan-Thompson， 2002； Sparkes ，1990） 。

社区伙伴关系可能会被视为一种压力和威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各方利益相关者。因此,要维持伙伴关系,领导者需要投入时间、理解、努力和个人魅力,但最重要的是,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相信这些努力是值得的。

与众多利益相关者合作以及课程改革都涉及诸多动态因素。为了未来的发展以及类似项目的成功,必须克服一些障碍。最初的问题似乎与学校繁忙的日常工作有关。作者曾竭尽全力邀请一些学校参与,但均未得到回应。作者联系了十所学校,其中六所同意参与。与作者和许多校长不同,并非所有学校领导都重视这次机会。一所学校的秘书代表学校做出了“不感兴趣”的决定,而校长则对电话、电子邮件和三次亲自拜访均未作出回应。有时,教师甚至没有阅读电子邮件,还有一所学校随机为孩子们选择体育项目(周五体育活动),然后又要求下周更换体育组别。

如前所述,明智地选择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是一项重要的策略。我们精心寻求能够实现双赢的合作关系。关系和信任都不能强求,因为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和信念至关重要。澳大利亚游泳协会和澳大利亚网球协会的情况正是如此,它们无疑是建立的最牢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问题结构

> 重要的是,不要按照预设的模板设计所有合作关系,而是要探索其预期的功能,然后确定最合适的结构。(ICSC 2014,第 32 页)

作者以务实的态度对待社区合作,预料到建立需要变革的关系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微观政治动态。有趣的是,在“最佳开端”项目进程中,主要的障碍并非这些已知的复杂关系。总的来说,利益相关者参与合作的意愿本身就是一大优势。相反,真正的问题在于现有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问题……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结构性问题。大学、学校、休闲中心和教育政策内部都存在结构性问题。

“关于农村和偏远地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文献指出,存在一系列影响有效培训实施的障碍。” 以下复杂因素被认为对农村社区的培训实施具有影响:

1. 受训人数较少意味着,支持此类培训的资金、资源和基础设施通常也相应有限。

2. 地理位置偏远给接受培训和寻找合格的培训师资带来了诸多困难。公共交通不便也是造成培训机会匮乏的主要原因之一。

3. 外部培训机构的影响一直备受争议。虽然人们承认它们能为社区带来专业知识和设施,但由于缺乏一对一的互动和后续跟进,人们认为它们并非真正以社区利益为重。

4. “薄弱”的市场 或者说,市场活动少,因此缺乏深度和规模 意味着能够提供的培训项目缺乏多样性,资金是提供更广泛项目的主要障碍。

5. 获得相关工作机会存在问题,不仅因为找不到工作,还因为公共责任问题和不断上涨的保险费用。

6. 在农村社区内,所有企业、教育和培训部门的培训方案的协调、推广和营销效果不够理想。(Clayton 等人, 2004 年,第 7 页)。

回想起来,作者的到来,他为满足吉普斯兰社区的培训需求而努力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以及ASCTA的引入,有时可能被当地社区视为“外来者”。在开放的培训市场中,已注册在州内或跨州开展培训的机构可以竞标在其服务范围内的任何地方进行培训。不可避免地,这会将一些外部培训机构引入农村社区(Clayton等人, 2004,第19页)。虽然他们的专业知识和设施能够为当地社区带来价值,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社区认为,由于缺乏一对一的互动和一般的后续跟进,他们并没有把社区的利益放在心上。

选择获得ASCTA SAT国家认可课程RTO20948并非难事,但维多利亚州乡村地区（吉普斯兰)的机构所面临的变化又使这一选择变得困难。在吉普斯兰地区,某些机构的政策有时只允许AUSTSWIM作为游泳培训机构（Gosper 2012）。一些机构奉行的商业资本主义理念与教育的社会公正理念（特别是2008年12月发布的《墨尔本青年教育目标宣言》)之间存在的意识形态矛盾,阻碍了特定合作关系的建立。

具体到教育领域,商业资本主义与教育的社会正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契合（Lynch 2012）。这不仅在各利益相关方制定升学途径和协商衔接安排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在大学内部也尤为突出。大学致力于在研究和教育方面追求卓越;特别是莫纳什大学,其学术强化举措使其在国际大学排名中近期大幅提升。然而,尽管该大学“努力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践行社会正义,但追求卓越仍然是大学的首要使命”（个人交流,2011年10月13日）。

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学院内部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障碍。面向选择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开设的六门课程,实际上是由莫纳什大学另一个校区管理的学科单元,其设计初衷是服务于行业（体育与户外休闲)和/或中学教育。这些课程并非专门针对小学教育,因此需要精心调整才能达到最初的教学目标。这往往十分困难,因为课程内容既要符合小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又不能改变既定的评估标准。每门课程都有其独特的特点,需要相应的结构来构建。另一个障碍在于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该课程每两年才开设一次。这种每两年才开设一次的模式不利于与学校和教职员工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社区合作与伙伴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是资金。然而,这与游泳课程的提供关系不大。这在当时令人惊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尽管多次申请内部和外部资金,但吉普斯兰的两个单元均无资金可用,也没有设备支持这项广受欢迎的课程的开发。健康与体育教育社区合作课程得到了教育和幼儿发展部 (DEECD) 的支持。

学校卓越教学中心计划,但并未获得任何财政援助。

对于距离周五体育活动场地较远的学校来说,交通费用是一个主要障碍。丘吉尔三所学校可以步行前往,而其他学校参加活动的唯一选择是乘坐公交车,行程最远可达30公里。

索普代尔小学的孩子们需要连续五周每周支付7.50澳元才能参加周五的体育活动,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购买器材本就困难重重,而社区体育场的一些器材丢失更是雪上加霜。贡斯基报告强调了资金问题,并指出“学校经费不仅仅是一个财务问题,它关乎澳大利亚的未来发展和保障。”(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 2012)

有人认为,“无论居住地、家庭收入或就读学校如何,每个孩子都应该享有最好的教育机会。”(ABC新闻， 2012)。基于优势的合作关系通常需要资金支持,用于课程的初期开发、拓展和可持续发展。相关计划旨在继续在学校内开展游泳和体育课程,并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 (HPE)的学习机会扩展到小学HPE课程中。英国ITE (教师教育协会)创新且成功的体育教育项目获得了资金支持,并在相关部门设立了全职行政职位,该职位在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毫不知情的是,莫纳什大学和政府曾制定计划,试图解释资金短缺的原因,而这些计划最终导致了“最佳起步”项目的终止和联邦大学的成立。同样,这项决定似乎也是基于财务考量而做出的。

最后,寻找解决政策和系统内部障碍的方案非常耗时。需要时间与学校和校长会面,与注册培训机构 (RTO) 协商;完成进一步的资格认证;与当地医疗行业谈判;完成资金申请;以及制定克服障碍、解决问题并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策略。尽管存在诸多障碍和阻碍,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所有利益相关者都高度重视所投入的努力和时间。

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表明,他们都对由此产生的学习社区协作表示赞赏。当地小学的孩子们兴奋不已,家长们也到场支持,教师、助教、家长和孩子们都表达了感激之情。正如劳伦斯（2015)所言,不同的兴趣总是存在的,它们并非成功的障碍,相反,“不同的兴趣会产生智力上的冲突,从而促使你找到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法”。

参考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2012年8月27日)。为什么需要审查学校拨款？ ABC新闻。检索自http://www.abc.net.au/新闻/2012-08-27/贡斯基报告里有什么/4219508 Austswim 澳大利亚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委员会。（2009）。澳大利亚式游泳和水上安全教学（第二版）。悉尼,新南威尔士州:莫斯比。

Balatti, J., & Falk, I. (2000).社区能力与职业教育和培训。霍巴特,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澳大利亚区域研究与学习中心。

澳大利亚区域研究与学习中心。(2001)。构建充满活力的学习社区。十个区域案例研究。朗塞斯顿,塔斯马尼亚州:澳大利亚区域研究与学习中心,塔斯马尼亚大学。

Clayton, B., Blom, K., Bateman, A., & Carden, P. (2004).哪些方法在您所在的地方有效?澳大利亚农村地区培训方案的实施。检索自http://files.eric.ed.gov/fulltext/ED495190.pdf

Datnow, A. (1998).教育变革中的性别政治。伦敦:Falmer出版社按。

维多利亚州教育与幼儿发展部。(2011年8月)。维多利亚州吉普斯兰高等教育计划（讨论文件）。检索自http://www.education.vic.gov.au/Documents/about/programs/distanceed/tertedupgipps.pdf

Dinan-Thompson, M. (2001). 教师面临健康和体育课程改革:信念、价值观、情感和互动的万花筒。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8 （1）,9-13。

Dinan-Thompson, M. (2002).课程建设与实施: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研究。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尤因,R.（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方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牛津大学出版社。
富兰,M.（1982）。教育变革的意义。纽约:教师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
Garvis, S. 和 Pendergast, D. (2014)。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Port 。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剑桥大学出版社。
Gosper, S. (2012年6月9日)。Austswim被指控排挤竞争对手。
澳大利亚人。
哈格里夫斯,A.（1997）。用心和脑重新思考教育变革。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课程与发展协会。
国际公民社会中心。(2014)。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成功的基石。检索自https://icscentre.org/downloads/14_10_02_
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pdf劳伦斯,G.（2015
年2月27日）。副总裁兼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AECOM Technology Corporation,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活动小组成员 “2015年多方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摘自http://webtv.un.org/watch/

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在2015年后发挥作用?
发展议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4084615948001莱辛格,K.（2015年2月27日）。全球价值
观联盟基金会创始人兼主席 世界展望会,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特别活动小组成员 “2015年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发挥作用,以促进2015年后发展议程”。检索自http://webtv.un.org/watch/

多方利益相关者伙伴关系如何使其在2015年后发挥作用?
发展议程经济和社会理事会/4084615948001 Lynch, T. (2012). 激流、暗流和障碍:调查维
多利亚州吉普斯兰地区澳大利亚青年教育目标的实现情况。

澳大利亚和国际农村教育杂志， 22(3),1-18。
Owen, C. 和 Bound, H. (1998)。行业学习优先事项:变革背景下澳大利亚区域面临的挑战。朗塞斯顿,塔斯马尼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澳大利亚区域研究与学习中心。

Pattberg, P.、Biermann, F.、Chan, S. 和 Mert, A. (2012)。公私合作促进可持续发展:出现、影响和合法性。

切尔滕纳姆:爱德华·埃尔加。
Robertson, I. (2008). 职业教育与培训教师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报告）。国际培训研究杂志， 6(1),1-22。

Sparkes, A. (1990).课程改革与体育教育:迈向微观-
政治理解。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育问题(第1-19 页)。
伦敦:卡塞尔教育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联合国大会。(2015)。第七十届会议 A/70/L.3 通过体育和奥林匹克理想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检索自http://unipd-centrodirittiumani.it/public/docs/UNGA_A_RES_70_4.pdf Zeichner, K. (2010). 重新思考大学教师教育中校园课程与实地经验之间的联系。教师教育杂志， 61(1–2)，89–99。